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书系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市场

——从孙中山、毛泽东到邓小平

ZHONGGUO XIANDAIHUA JINCHENG ZHONG
DE GUOJIA YU SHICHANG

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组编

王文章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教育部人文社会

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书系

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组编

王文章 著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市场

——从孙中山、毛泽东到邓小平

ZHONGGUO XIANDAIHUA JINCHENG ZHONG
DE GUOJIA YU SHICHANG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市场/王文章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8

(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书系)

ISBN 7-301-07545-6

I. 中… II. 王… III.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研究-中国
IV. F123.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5914 号

书 名: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市场——从孙中山、毛泽东到邓小平

著作责任者: 王文章 著

责任编辑: 胡利国

标准书号: ISBN 7-301-07545-6/D·091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mm × 1240mm A5 11.5 印张 329 千字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1.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书系

编 委 会

主 任 吴树青 黄楠森 赵存生

副主任 王 东 陈占安 夏文斌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东 王明舟 庄福龄 冷 溶

陈占安 李忠杰 吴树青 张黎明

赵存生 夏文斌 袁贵仁 黄宗良

黄楠森 薛汉伟

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书系

总 序

在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这套“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书系”奉献给广大读者,以表示我们对这位世纪伟人的深切怀念和由衷敬仰。

这套书系共含八部著作,即《邓小平与当代中国和世界》、《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现代化》、《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内在的统一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市场——从孙中山、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的人力资源与现代化——邓小平人力资源理论研究》、《海外邓小平研究新论》。这些著作分别是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王东教授、梁柱教授、吴树青教授和陈占安教授牵头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及其源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现代化”的最终成果。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将之作为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重点图书予以推出。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几年来,这两个课题组的老中青学者,或侧重于邓小平理论的理论研究,或侧重于邓小平理论的应用研究,殚精竭虑,筚路蓝缕,力图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对邓小平理论及其应用的研究推向深入,以适应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需要。应当说,学者们的研究是认真的,严

肃的,也是十分努力的,大家力求使这些用自己心血化作的成果能够对广大读者和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有所裨益。但因为限于研究者的现有水平,更由于形势和任务的快速发展,这些著作中也难免程度不同地留有一些不足和缺憾,故此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对于这套书系的出版,教育部以及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的有关领导同志,北京大学以及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有关领导同志,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全力支持这项工作,保证了本书系的顺利出版。对此,我们深表感谢!在写作本序的时候,我们不由得想起了邓小平说过的两段话。这两段话深深地刻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

一段是1981年2月14日为英国培格曼公司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所作的序言中说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们的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也经历过各种深重的苦难和进行过付出巨大代价的、坚忍不拔的斗争。现在,我们正在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建设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我深深地相信,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世界的未来是属于世界人民的。”

另一段是1989年9月4日为请求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说的:“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些话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发自肺腑的声音。这些话所表达出来的深挚的情感、睿智的思想、坚定的信念、磊落的胸襟,为我们矗立了一座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碑。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进一步学习、研究和实践邓小平理论,在全面、准确理解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把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结合起来,既把握它们各自的科学体系又把握它们之间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辩证联系,适应形势任务发展变化提出的新要求,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我们将矢志不渝、尽心竭力地为此而奋斗!是有序。

吴树青、黄楠森、赵存生

2004年5月

目 录

总序	(1)
导言	(1)

第一篇 民生主义的国家与市场

第一章 民生主义产生的背景	(37)
第一节 第二次技术革命与世界三大潮流	(37)
第二节 清末现代化努力的失败	(40)
第二章 振兴中华与平均地权	(45)
第一节 民主共和国理想与建立强大的现代国家	(45)
第二节 平均地权与国家干预再分配的市场经济	(51)
第三章 威权主义与节制资本	(61)
第一节 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目标的形成	(61)
第二节 节制私人资本与发达国家资本的混合经济	(69)
第三节 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思想的发展	(78)
第四章 民生主义与国民党政府的官僚资本主义	(89)
第一节 民生主义的三种可能的发展方向	(89)
第二节 走向官僚资本主义	(97)
第三节 官僚资本主义的膨胀	(107)

第二篇 从新民主主义到计划经济的国家与市场

第五章 从新民主主义走向苏联模式的时代背景	(119)
-----------------------------	-------

第一节	资本主义大动乱与苏联模式	
	社会主义的兴起	(119)
第二节	资本主义现代化在中国的流产与以俄为师	(121)
第六章	国营经济为领导、保持私营经济和市场机制	
	的新民主主义模式	(123)
第一节	农村的大变动与中国现代化的起步	(123)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128)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模式的全面实施	(136)
第四节	强国家与弱市场的结合特点	(146)
第七章	以高度国有化为基本框架的计划经济模式	(158)
第一节	从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到过渡时期总路线	(158)
第二节	超越“搞早了”和“搞快了”	(160)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内在矛盾	(162)
第四节	赶超发展战略的选择与走向苏联模式	(166)
第五节	“一五”时期的成就和问题	(176)
第八章	国家调节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的改良模式	(187)
第一节	以苏为鉴,探寻自己的道路	(187)
第二节	“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制度设计	(191)
第三节	探索的历史局限	(194)
第九章	既排斥市场机制又半无政府状态的动员体制	(203)
第一节	“大跃进”与行政动员体制	(203)
第二节	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探索及其历史局限	(215)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与国家发展能力的破坏	(219)

第三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与市场

第十章	中国率先突破苏联模式的背景	(245)
第一节	时代发展的挑战	(245)
第二节	毛泽东时代的遗产	(250)
第三节	发展危机与高瞻远瞩的领导	(262)

第十一章 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	(270)
第一节 强势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	(270)
第二节 民间市场因素自下而上的推动	(273)
第三节 政府推动与市场推动相结合的几种形式	(277)
第十二章 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选择	(283)
第一节 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	(283)
第二节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289)
第三节 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293)
第四节 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 基础性作用	(297)
第十三章 政府职能的转变	(308)
第一节 中国政府的作用与政府职能的现状	(308)
第二节 政府职能的转变:新阶段改革的重点	(316)
第三节 建立有效政府与防止坏的市场经济	(324)
参考文献	(338)
后记	(355)

导 言

一个现代化的后来者要成功地走向现代化,有两个基本条件是不可或缺的:一是需要有一个有现代化取向的强大、有效的政府。没有这样的政府,就不可能有政治的稳定,就不可能把社会内部蕴藏的发展潜力有效地动员起来。二是逐步建立起一个国家和市场的边界合理的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人类文明的现阶段,没有这样的体制,就不可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就不可能从粗放发展向集约发展转变,就不可能把科技成果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中国是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探索和奋斗才逐步具备这两个条件的。而在这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一个多世纪里,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1]

—

本书试图从国家与市场这个独特视角,来审视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思想与实践。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和现代化理论的基本问题,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成千上万,但至今还很少有人从这个视角来梳理他们的有关思想和实践。

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与市场两方面互动的结果。建立怎样的国家与市场关系模式,实际上就是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发展模式。选择是否正确,关涉到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比较复杂。一方面,二者都有重要作用,它们相互依存,不可或缺,单有国家或政府的竭尽全力,或者只有民间与

市场的无限努力,都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国家与市场都有失效和失灵之处,都存在着弊端。马克思对市场的弊端的分析是众所周知的;其实,他对国家的弊端的分析也是十分深刻的。例如,他在谈到路易·波拿巴时曾经指出:国家机关有自己的特殊利益^[2]。恩格斯就这个观点发挥说:“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样的例子不但在世袭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内也同样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是否就能立即根除呢?不能。恩格斯接着说:“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3]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深刻观点越来越被当代经济的发展所证实。西方经济学在经历了漫长的道路以后,在分析实行凯恩斯主义带来的严重恶果以后,才认识到“政府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机关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布坎南指出:在西方社会,政策的制定者也追求他们自己的最大利益——政治利益,而不管这些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尽管他们可能有反映公共利益的愿望,但这种愿望也不过是许多愿望之一罢了。政府往往为代表特殊利益集团的政策制定者(政治家、官僚等)所操纵,由此滋长了种种经济和政治的弊端。^[4]当代新制度学派的代表诺思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悖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5]科斯在分析政府的经济政策为什么会无效率时也指出了国家作用的双重性:“显然,政府有能力以低于私人组织的成本(或以没有特别的政府力量存在的任何一定比例的成本)进行某些活动。但政府行政机制本身并非不要成本。实际上,有时它的成本大得惊人。而且,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政府在政治压力影响下产生而不受任何竞争机制调节的,有缺陷的限制性和区域性管制,必然会提高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而且这种适用于许多情况的一般管制会在一些显

然不适用的情况中实施。基于这些考虑,直接的政府管制未必会带来比由市场和企业更好的解决问题的结果。但同样也不能认为这种政府行政管制不会导致经济效率的提高。”^[6]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也说:“如果没有一个明智的政府的积极促进,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经济进步,……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政府给经济生活带来灾难的例子,以至于要写满几页警惕政府参与经济生活的话也是很容易的。”^[7]总体上说,国家干预经济存在着诸如高成本、低效率、经济缺乏活力、短缺经济、巨额财政赤字等弊端。国家干预不当,已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里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副作用。

由上可知,无论是国家还是市场,只建立起有利于单方面的游戏规则,都会产生令人极度失望的社会后果。^[8]只有在充分发挥国家和市场各自不可取代的作用的同时,抑制它们的副作用和可能造成的消极后果,才能有助于经济的发展。那么应该建立怎样的国家与市场关系模式呢?这恐怕是经济学和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永恒课题,因为在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它们的合理边界是各不相同的。国家作为最高的政治权力机构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性;一是它可以合法使用暴力,具有强制力。国家的这些特点,以及市场的不完备状况,使得国家有足够的理由强制地利用公共权力,来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进行干预,以便实现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就此而言,市场从来就没有完全“自由放任”过,国家对市场一直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控制和调节,只是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和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各国所采取的调节方式和调节手段有所不同罢了。相对来说,在世界现代化早期特别是放任主义经济时代,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干预较少,“看不见的手”的市场主导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只是确保市场正常运作的“守夜人”,即只管“法律和秩序”^[9],以调节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以及不同群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保证经济的良性发展。第二次产业革命之后,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发展的日趋复杂和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单靠市场的自我调节已无法处理因发展而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由此,国家不再龟缩于保护性职能的边界之内,而是越来越

越多地介入到以前完全属于私人领域的经济活动之中。^[10]即便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修正后,各种新经济学派在承认企业制度和市场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因而而是相对有效的制度安排的同时,仍然强调国家的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在提高经济增长率方面的重要作用,亦即国家调节仍具有重要意义。

就大多数实行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来说,这种国家干预一般是不以破坏市场自主性发展为前提的。与现代化的先行者相比,国家在现代化后来者的发展中的作用更为重要一些^[11]:一是由其富国强兵的防御性现代化性质所决定的;二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些发展落后的国家里根本不存在,即使有也很稚嫩弱小。由此,现代化的急迫性和经济发展的落后性,迫使这些国家的政府不得不亲自出面来组织现代化的建设,并培育和保护市场体制的成长。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像日本那样国家在培育起较为完整的市场体制之后,就脱离经济建设第一线,只担当起市场保护者的角色,因此其现代化绩效较为引人注目;一种是像第三世界里的大部分国家所表现的那样,国家一直没有退回到它原有的位置,结果不但没有培育起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而且还压抑和消灭了市场的发育,由此其现代化的绩效不尽人意。总之,国家的作用一定要适度。诚如两百多年前法国革命家米拉波所说:“如果国家太强硬,它会把我们压垮;如果它太软弱,我们也会被拖垮。”^[12]

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无论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现实实践中,都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重要意义。这是由以下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方面,与一般理论假想所设定的理想模型不同,近代中国因为不完全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由此首先在民族主义旗帜下实现国家的完全独立,建立和维持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和有效的中央政府,是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成功地走向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如何正确认识国家 and 市场各自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根据中国的国情确定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建立一个受到法律保护、自主发展的有效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在 20 世纪对中国现代化道

路的探索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们对这两个基本问题的认识和解决的程度来评价的。

本书试图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在从中国国情出发回应时代挑战中,在实践的推动下,来描述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有关理论和实践。

二

19 世纪后半期,当中国被西方列强强行纳入现代世界体系,开始了半殖民地式的现代化进程时,西方发生了以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二次技术革命,掀起了第二次工业化浪潮。随着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兴起,不但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大提高、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显著变化,而且使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为当时世界的三大思想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孙中山的至理名言。他的三民主义就是顺应世界潮流而生的。殖民地扩张推动的世界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的发展,成为其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西方民主化的强劲发展,是其民权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是其民生主义的重要根据。

当孙中山为争取西方已经实现的理想而斗争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既有巨大的增长,又有严重的危机。生产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生产量的增长远远快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增长。1873—1895 年出现了价格、利润和收益一并下降的被称为大萧条的时期。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文明的昌盛、科技的发达;另一方面是两极分化,阶级之间的激烈冲突,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1895 年,英国政治家塞西尔·罗得斯忧心忡忡地谈到了英国当时面临的尖锐矛盾,并用十分露骨的口吻主张把这些矛盾转嫁到落后国家。他说:“我昨天在伦敦东头(工人区)参加了一个失业工人的集会。我在那里听到了一片狂叫‘面包,面包!’的喊声”,“为了使联合王国 4000 万居民免遭流血的内

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生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就是吃饭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13] 1896年孙中山在游历英国伦敦时,看到了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上不平等的现状。他指出“统计上,英国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千倍,人民的贫穷甚于前代也不止数千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14]。但他得出了与罗得斯完全不同的结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要“取其善果,去其恶果”,不仅需要毕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于一役,而且需要毕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于一役。

当孙中山在探寻振兴中华和避免资本主义祸害的道路时,德国的经验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时德国是后起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典范,它走了一条与英美不同的道路,把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和国家的巨大力量联合起来,使本来经济相对落后的德国后来居上,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了英法两国。有意思的是,这个经验曾对两个东方大国的社会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一个是对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是对中国的主观社会主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列宁说,德国“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化的原则,把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和国家的巨大力量联合成一部机器,使千百万人处于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组织之中”^[15]。列宁认为在经济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既没有必要立即消灭私有制,也没有必要立即消灭资本主义,在土地国有化和银行国有化等条件下,可以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并实行计划经济。他提出,俄国人“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仿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16] 对于急于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来说,德国的成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吸引力。^[17] 革命党人冯自由 1906 年在谈到国家社会主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铁路、银行、航船运输、邮政—电气化以及烟草和制糖业实行国有时,就认为德国经济的巨大增长是由于德国全部对内政策以“国家社会主义”为基础的^[18]。民国初成,孙中山就指出:“中国十年以后,必至有十万人以上之大资本家,此时杜渐防微,惟有提倡国家社会主义”^[19],应当取法德国,由国家把“一切大

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20]。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上,民生主义强调国家作用的一个重要背景就在于此。

在毛泽东时代,国家和市场的天平仍在不断地向国家倾斜。这是资本主义大动乱、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弊端大暴露的年代,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兴起的时代,是苏联的计划经济取得震惊世界的成就的时代。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苏东剧变发生以后指出的,“1914年到1950年前后,资本主义似乎在一切方面都出了毛病”。“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一塌糊涂,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头一次显现出全面崩溃的迹象”。“60年前,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曾排着队去莫斯科探寻‘计划’的秘密,这种计划使苏联免遭使西方倍受折磨的大衰退”^[21]。这是西方国家借鉴苏联经验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年代。在西方,“从1930—1970年间,政府在大多数国家发挥了日益增长的作用。在这个时期,许多私人工业实行了国有化,或由政府接收和经营。”^[22]

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受到严重挫折的年代。中国人与世界大多数落后国家一样,首先是以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来回应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的挑战的,但是没有成功。资本主义现代化努力的屡次失败使中国人备感沮丧,而国家屡遭欺凌的屈辱地位又激发起了中国人的反抗情绪。在该历史背景下,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探索现代化的道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从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转向了“以俄为师”,参照苏联经验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又借鉴苏联经验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尽管在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中,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新民主主义模式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苏联模式的深刻影响,并以建立苏联模式为其目标。毛泽东在1949年1月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经济成分包括国营、合作社、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租借)、私人资本、个体。……决不可以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的和向